

关于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

——从《红楼梦》英译本中原语文化意象的缺损谈起

吴毅

(湖南商学院外语系, 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 文学翻译中文化问题比语言问题更重要。通过分析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缺损情况, 指出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应遵循“文化传真”与“存异求同”之原则, 灵活使用各种翻译方法, 力求保持原语文化意象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关键词: 《红楼梦》英译本; 文化意象; 文化传真; 缺损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1-0133-05

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曾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他(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由此看来,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信息的移植。翻译不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逾越文化的鸿沟。归根结底,语言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可以说,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一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中国文化的汉译英尤其如此。众所周知,汉语文化有着渊源久长的历史,它所包涵的内容和覆盖的内涵繁杂而广泛。如何把汉语文化的内涵通过翻译尽可能完整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对译者来说绝非易事。以被誉为中国文化“百宝箱”的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为例。《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含量极高的文学作品,它对家庭伦理、风俗民情、审美价值等都有所涉及,内容庞杂,包罗万象。《红楼梦》的外文译本和节译本不下10种,其中最完整、最有影响的当属霍克斯(David Hawkes)译本^[1]和杨宪益(Yang Hsien-Yi)^[2]译本。从整体效果上看,霍译与杨译《红楼梦》都传达出了原作语言的美感和思想的深邃,均可称为汉文学英译领域中的经典之作。但无论是霍译还是杨译,虽然成功地传达出了原作的基本信息,但在某些方面却忽视了文化意象的深层意义,故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进而影响到译入语读者对原作的正确把握。

本文通过分析《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原语文化意象的缺损现象,试图来寻求文学翻译中如何避免文化意象缺损的有效途径。

一、《红楼梦》英译本中原语文化意象的缺损

(一) 书名中“红楼”的文化意象的缺损

杨译《红楼梦》采用了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一书名。尽管书名里面包含了“红”的对应词 red 和“梦”的对应词 dream, 似乎不应有什么疑问, 但译入语中的 Red Mansions 仅指“红色的楼”而已。事实上, 汉语文化中的“红楼”并不单单指红颜色的房子或楼阁, 还指华美的住房, 旧时富家女子的住处, 又有爱情的联想。有古诗词为证:“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李商隐);“红楼别夜堪惆怅, 香灯半卷流苏帐”(韦庄)。”况且,《红楼梦》一书中也并没提到任何一栋红房子是故事的发生地。因此, 由于英语里没有与“红楼”完全对应的词, 书译名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也就无法在不丧失“红楼”字面意义的同时, 准确完整地传达出其隐含和比喻意义, 从而使“红楼”这一汉语名词所特有的文化意象出现在译文中。我们再来看霍译所采用的书名 The Story of the Stone。相比之下, 笔者认为霍译

书名更贴切原文。原因有二:一是曹雪芹这本名著的最早写本就叫《石头记》;二是原作者曾声称,《石头记》原本是记在一块大石上的有关这块宝贝石头“坠落他乡,投胎之处,亲身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一位空空道人由此经过,看了之后,把它“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3],于是有了这本书。霍译书名弃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不用,不失为妥当之举,避免了译语读者的误解。“红楼”二字究竟怎样译为好,目前尚无定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出版的《红楼梦学刊》曾一度直接采用音译,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它把“红楼”作为一种源自中国汉语文化的独特的文化意象,给译语读者以特定信息的暗示,让译语读者熟悉和理解其文化涵义。

(二) 其它有固定指征的文化意象的失落

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因其地域、环境、传统、文化的差异,往往对一些相同的意象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正如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译者如果不注意原语文化意象的取向和指征,就会出现错译。《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皆有此类范例^[4]。

例1: 鸿归蛩病可相思(第三十八回)

霍译: The geese return; the crickets mourns his fate.

杨译: When swans fly off, crickets chirp, does your heart ache?

“鸿”“蛩”在中国古汉语中分别指代“天鹅”“蟋蟀”,“鸿归”“蛩声”则常表示凄凉、哀婉的意象,原语读者可轻轻松松地随原作进入一种凄凉、萧瑟、失落的情景,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来说,进入此景确有相当大的难度。杨译采取直译来保留原作的文化意象,让译文富含了原作的寓意与想象。但如果译文在此处能加注一下,将意象的深层内涵表达出来,这样既保留了原语文化,又能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一样的感受。不管怎样,笔者认为杨译仍优于霍译。霍克斯用 geese 代替“鸿”(天鹅),令笔者无法接受。因为天鹅这一鸟类动物无论是在东方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里,都给它赋予了人性化的形象。西方文化里著名的《天鹅湖》就讲述了有关天鹅的一段凄美故事,所以霍克斯大可不必因担心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将其改为极为普通的、缺乏独特文化意象的 geese(鹅),虽然他在后面用“mourns”一词补译出了诗句的凄凉意境,但却损害了原作整体的和谐性。

例2: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第七十一回)

霍译: Faithful inadvertently interrupts a pair of love birds.

杨译: Yuanyang happens upon two lovers.

原作中“鸳鸯女”指贾母的贴身丫环鸳鸯,其后的“鸳鸯”则指丫环鸳鸯偶遇司棋和她的姑舅兄弟幽会一事。前一个“鸳鸯”,杨译和霍译分别音译为 Yuanyang 和意译为 faithful^①,都有其合理性,难分优劣。但后一个“鸳鸯”的译法,霍译 a pair of love birds 似乎比杨译 two lovers 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鸳鸯在汉语文化中是爱情鸟,象征着忠贞的爱情和恩爱的夫妻。a pair of love birds 既有具体的意义,又不乏联想意义,霍译在此处对中国文化因素的传达比杨译更恰当,更到位。而杨译则从根本上遗漏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意象,有较强的异化倾向。

(三) 习俗和宗教文化意象的歪曲

习俗即习惯和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文化规约,而宗教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几乎与人类文化同步产生和发展。不同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红楼梦》深邃的文化内容包含了有习俗和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译者在翻译这本名著时,理应完整正确地再现它们,但比较《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却发现了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可以说是歪曲了原语的某些习俗与宗教文化意象。

例3: 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去世,…”(第三回)

在西方文化中,说到男人的“配偶”,最常用、语义最清楚的是 wife(妻子),不像中国明清时期男人对自己妻子的称呼有几种,如贱荆、拙荆、山荆。上述例句中的“贱荆”是林如海称呼自己妻子的。同为“妻子”之意的“贱荆”,就极具中国古汉语文化特色,但在翻译时则构成了文化差异的难题。“贱”在汉语中属谦辞,同类称谓还有如“贱臣”“贱民”等。因此,旧时男人称自己的妻子为贱荆,实为谦称,毫无贬低之意。杨译将“贱荆”译成 my wife,霍译为 my poor wife,译语读者一般会将 my poor wife 理解为 deserving pity or sympathy, unfortunate, 因此, poor 和“贱”只是表面上的对等。由于英语中难以找到称谓效果相同的谦词,要把“贱”字直译出来,还真是困难。与其勉强让 poor 这一可能使译语读者误解的词取代“贱”,还不如像杨译那样干脆不译。汉语文化整体

文词谦敬系统的可译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还未谋求到合适途径之前,避开此类谦辞不译,也可防止出现画虎不成反成猫的情况。

另外,众所周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佛教和道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从深层的宗教意识、中层的宗教行为到表层的宗教器物(圣像、神像等)都存在着许多观念对立和文化冲突。但在《红楼梦》英译本中却有这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况。

例4:刘姥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第六回)

霍译:…said Grannie Liu,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We must leave it to the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 ll help us or not, …”

杨译:…said Granny Liu,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

从宗教背景和深层文化差异来看,原文中的“天”究竟是“God”还是“Heaven”,“菩萨”是“lord”还是“Buddha”呢?“天”本是中国道教的概念,是对所有神灵的统称,菩萨是佛教大神,而“God”和“lord”是典型的基督教概念。很明显,霍译游离于中国的佛、道教之外,完全站在译语读者基督教文化的立场上,擅自把信佛的刘姥姥变成了西方的基督教信徒,让人啼笑皆非。杨译则比较照顾原作的宗教文化色彩,较好地再现了中国宗教的文化内涵,使译语读者更真实地感知到中国宗教文化。^[5]

上述各个对原语文化意象缺损的范例表明,译者常常用译入语读者熟悉的意象去调动读者的联想,这样一来,译文是民族化了,但同时也把原作民族的东西“化”掉了。

二、翻译时文化意象传递的原则和方法

翻译的真正归宿是通过语际转换再现原语文化(或原语文化意象)。一般说来,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慢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该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就会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的沟通。但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

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文化意象,译者如果只译出这种文化意象的表层意义,而回避其深层意义,就会使原文本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缺损或歪曲,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信息传递上的偏差。因此,好的译文不仅要求语言优美流畅,更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保留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但是,文化意象的翻译问题,往往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把译者推到一个“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境地”,可见文化意象的等值传递并不是件轻易的事。但这也不意味文化意象的传递无法可依。笔者在此就文化意象传递之原则与方法提出几点拙见,以供译者参考。

(一) 文化意象传递的原则和对译者的要求

鲁迅的翻译主张认为,在翻译中既必须“力求易解”,又必须“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实际上这是对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的论述。原文文本在语言上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尤其是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如果我们把文化意象传递的原则分为目标原则和行为原则的话,那么其目标原则就是要在文化意象传递的过程中实现文化传真(Cultural Facsimile)。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文化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传真。质的传真是文化传真的基础,也就是指原作中文化性质的准确把握与传递;量的传真是文化传真的进一步体现,它要求在把握质的正确的基础上,力求完整地传达文化信息,不损害原作的整体文化气氛的和谐性。文化意象传递的行为原则是指在处理文化差异时,译者应采取“存异求同”的策略来确保文化含义的传真,尽量保存外来文化之“洋味”。拿《红楼梦》的中译英来说,就是尽量不要将异质的西方文化“血液”硬输入中国文化之中,而忽视中国的民族文化个性。“存异”可以使译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更为贴切与真实,从而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与启迪。

文化意象的传递问题,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译者不应满足于传达原语文化意象的一般意义,而应把尽最大可能传达原语文化意象的深层意义也视为自己的职责。译者应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自觉性,不能光在语言上做文章,还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这里的“文化人”实际上就是要求译者即要精通原语语言,又要了解原语民族的文化,还要熟悉其政治、

历史、风俗习惯、哲学思想等。奈达给译者划定了必备的文化知识结构^[7]:



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知识结构愈博愈好。译者应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做到能触类旁通。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知难而上,广泛参考,多方请教,细心琢磨,切不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二) 避免文化意象缺损的具体操作办法

如何传递文化意象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传统翻译向来重视内容而轻视形式的意义。尤金·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就忽视了形式的意义,有其局限性,译者应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选用合适的翻译方法。笔者认为,对带有文化特色的文本,特别是如《红楼梦》这种具有浓厚文化内容的文本,译者应尽可能以纽马克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理论为指导,而避免过多使用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因为纽马克认为,交际翻译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对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对其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接近的效果,而语义翻译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以保证贴切地传达原文的准确的语境意义^[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的传递方面。交际翻译完全以译语文化取代原语文化,即完全的归化;语义翻译保留原语文化,即保留洋味,主张“异化”。因此,从文化意象传递的目标原则——文化传真来看,译文应是越有“洋味”越好。文字上不得不进行一些“归化”时,也应以尽量不引起“文化归化”为前提。比较《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我们不难看出,杨译侧重语义翻译,而霍译更偏重交际翻译。

捷克翻译理论家伊列克在其《论意象的翻译》一文里指出了译者在翻译意象时的三种弊病:意象常常被略去不译;意象被译者解释、引申而遭破坏;一个新鲜的意象常常被陈旧、平庸的意象所取代。这三种情况不能不为译者所警惕。所以译者在处理文化意象的翻译问题时,一方面以适当的宏观翻译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在微观的操作方法上也应灵活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既能忠实于原文内容,又能

保存原语文化意象者为先。一般来说,要保证翻译中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具体可以采用以下4种方法。

(1) 直译法。用译语中的“对应”词译出原语中的文化信息,这样就能避免原语文化特征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或缺损。如前文“鸿归蛩病可相思”一例中,杨译的“鸿”(swan)就比霍译的“鸿”(geese)好得多,没有丧失原文的丰姿。

(2) 增词法。文化意象一般都有表层和深层两层意义,有时完全直译,则传达了表层意义而丢失了深层意义;完全意译,又可能丢失原文的文化意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不妨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以达到既达意又保存了文化意象的目的。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译文“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 Geliang, the master mind.”就是使用增词法达到最佳效果的范例。

(3) 加注法。在直译无法交待清楚原文中的一些具有文化色彩的典故、人物、风俗习惯或成语时,为了既保留住原语文化及其语言特色,又能帮助译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译文加注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在《红楼梦》的霍译本里,霍克斯在译“宝玉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这句话时,就用一大段译者自己的话对句中的“掷骰子赶围棋”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游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由于这是原文没有的文字,所以霍克斯不如把这段文字以注释的方式标识出来会更好些。当然,鉴于小说这一文学题材的特殊性,我们不主张过多使用注释,以保持小说的趣味性、连续性。

(4) 音译法,包括音译与音义兼译。不同民族文化个性的差异导致一些原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象在译语中的“词汇空缺”或“词汇冲突”等现象,如果一味硬译死译,或牵强附会,则词不达意。如果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就不仅保存了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可吸收外来语,丰富译语语言文化^[9]。所以如前文所述,80年代曾一度使用音译来译《红楼梦》书名,自然有其合理性。

三、结语

以《红楼梦》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缺损现象为例,通过对文化意象传递的原则和途径的探讨,我们可以获知:尊重原作,实现文化传真才是翻译的总原则。我们不必将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译成“穷

得像乞丐”,而“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不仅同样能传达原文的信息,而且还能引入新的形象,丰富译入语民族的文化意象。总之,对原语文化意象的处理,过度归化的译法(即采用交际翻译理论)只是对译语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虽然它使人们领略到不同文化之间不谋而合的妙趣,降低了读者接受的难度,但同时也以牺牲大量文化附载信息(文化意象)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鉴赏和了解异质文化的机会。事实上,由于文化具有开放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各种文化意象容易被人们接受,并逐渐约定俗成,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译者大可不必劳神费力地把包子改做成面包塞给读者。

“Traduttore, traditore”(译者,叛徒也)。这句意大利谚语真给译者扣了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但也说明翻译工作确实不易。面对困难,译者的态度不是逃避,而是知难而上。在文化意象的传达问题上,译者需遵循“文化传真”与“存异求同”的原则,灵活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不得任意抹杀和歪曲原语文化意象,而要力求保持原语文化意象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促进文化交流。如把《红楼梦》译成外文,就应使译文读者如同中国读者一样,不知不觉走进大观园,遇到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刘姥姥等一大批人物,并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同情或憎恨,同时还领略到

中国灿烂辉煌的宗教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艺文化、戏曲文化、茶文化等。

注释:

- ① faithful(忠仆)是霍克斯对丫环名称的统译。

参考文献:

- [1]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Great Britain: Penguin Books Ltd, 1986.
- [2] Yang Hsiang-yi,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 [3] 陈国华.《红楼梦》和《石头记》:版本和英译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445-449.
- [4] 宋淇.试评《红楼梦》新英译[A].香港红学论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356-425.
- [5] 蒋磊.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 [6] 彭长江,顾延龄.译海探秘[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9.
- [7] 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8] 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9]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北京:文学出版社,2000.

On diversion of cultural images in C-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U Y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nan Business Colleg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anguage itself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aking the inversion of the original cultural image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for examp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ranslator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facsimile and reserving differences while seeking common ground in order to keep the original culture imagery intact through different approaches, when dealing with the matters of culture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culture imagery; cultural facsimile; imperfection

[编辑: 苏慧]